

一

在聂耳出生前的一百多天日子里，正是中国人民为结束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，推翻清朝260多年统治而进行最后斗争的电闪雷鸣的时候。聂耳在母亲不平静的胎胞里躁动着，也一定被辛亥革命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和昆明10月30日即阴历九月九日的“重九起义”的枪炮声和呐喊声震撼了。之所以要强调这种震撼，是因为蔡锷、唐继尧等将军的新军所攻打的清王朝在云南的最后堡垒——总督府衙门，就近在聂耳出生的楼房北面只有数百米的地方。

然而不幸的是聂耳长到4岁时，父亲病故，母亲一人担负起行医养家的重任。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在他之上有三个哥哥、两个姐姐，这样一个7口之家，靠一个粗通切脉诊病配药的傣族妇女维持，其贫苦状况可想而知。甬道街又是地处“总督衙门”的城中闹市，房租昂贵，聂耳一家便在聂鸿仪逝世3年后举家迁居端仕街，不久又搬往更偏远的青云街。可惜聂耳童年和少年时代居住过的端仕街、青云街的房屋都已被拆

迁，早已难觅故居痕迹。

然而值得庆幸的是，甬道街这栋小楼在沧桑岁月中没有被湮灭，被作为历史文物而受到保护。在聂耳7岁那年即1919年聂家搬走后，杨氏门中从曾祖父杨暹、祖父杨春霖以及与聂耳同辈、相差5岁的杨镒和后代子孙一直都住在这里，成为聂耳故居的守护者和见证人。

当然，聂耳故居也并非原封不动。上个世纪30年代因拓路，小楼附属的厨房书房两厢耳房被拆除；到40年代中期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，龙云和卢汉将军决定在清朝总督署旧址建造“抗战胜利堂”（即今日的人民胜利堂），因扩大广场、拓宽街道，这栋小楼虽被拆动后移，但仍用原屋材料、保持原屋面貌建造。虽然聂耳故居里已没有聂家留下的生活物品，但我每次前来拜谒，都能在杨家后人的讲述中感觉得到，从屋里一根根古老的梁柱，从房顶一片片古老的青瓦，从屋后一块块古老的石板和那眼古老的水井里，依旧回响着聂耳童年的欢声笑语……

三

由于聂耳在学校期间参加了一些进步的革命文艺演出活动，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。为了躲避抓捕，聂耳被迫于1930年7月10日离开昆明。谁也不曾想到，聂耳此次离开昆明，竟然成了他与故乡和亲人的永诀。

聂耳从滇南河口出境，取道越南海防再经香港前往上海，并顶替他三哥聂叙伦在上海云丰申庄当了会计。后因云丰申庄亏本倒闭，聂耳失业。接着，聂耳报考了音乐家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剧社，被顺利录取，拉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。1932年4月聂耳通过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，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由张曙、任光、吕骥、安娥等革命音乐家组成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。由于与黎锦晖在音乐的时代性与艺术使命存在分歧，聂耳离开了明月歌剧社。

1932年8月，聂耳来到北平，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各种活动。但因北平难以求职，生活无着落，同年11月返沪。鉴于聂耳的思想觉悟与音乐才干的突出表现，随即被地下党组织安排到联华影业公司工作。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、夏衍监督，聂耳

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秘密地举行了入党宣誓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迈上了如聂耳自己所说所向往的“代替大众在呐喊”又“保持高度艺术水准”的新兴的革命音乐家道路。

1933年夏天，聂耳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《开矿歌》，这是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故事片《母性之光》的插曲。接着聂耳又为独幕话剧《饥饿线》创作了插曲《饥寒交迫之歌》，还为街头的小报童创作了《卖报歌》。在担任联华影业公司音乐股主任，为影片作曲、配音，辅导演员唱歌的同时，聂耳还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组织部负责人等职务。由于聂耳积极参加左翼文艺的各种活动产生巨大影响，联华影业公司老板迫于压力，以聂耳“有病需要休养”为由，于1934年1月解雇了他。

党组织随即又安排聂耳进入英资企业百代唱片公司担任录音、作曲等工作。这期间聂耳先后为田汉的歌剧《扬子江风暴》创作了《打桩歌》《打砖歌》《码头工人歌》《苦力歌》等中国最早的劳工歌曲；还为电影《桃李劫》谱写了主题